



01

第一部分  
经典英语成长小说

Classic English  
Bildungsroman

## 导 言



经典英语成长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其中的经典情节线索均聚焦于一位野心勃勃的男性主人公，他“在乡村的贫寒家庭成长，但被灌输了一种冒险精神，离开家寻找自己的命运，并实现他的雄心”<sup>1</sup>。成长小说研究专家杰罗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在《青春季节》（*Season of Youth*）中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成长小说情节”提供了一种“大致轮廓”：一个敏感孩子在乡村或者偏远小城成长，在那里他发现社会和情感的藩篱限制了他的自由想象。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亲，对他的创造性的本能、想象和雄心十分反感，甚至憎恨，因此，他在青葱岁月就离开了那个压抑的家庭环境，去城市寻找独立的发展之路。在那里他的真正的“教育”开始了：他至少经历了两次恋情或者性行为，见证人情世故，学会生存本领，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并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价值，于是他摆脱了幼稚的青春岁月，进入到成熟期。他的成长完成了，重回故园，展示自己的成功或者他的选择的明智<sup>2</sup>。此种情节框架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经典英语成长小说中都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见，传统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旅程的终点是与自我和社会达成和解，求得人生的和谐。传统的成长小说在线性地记录下主人公与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得认同的过程中，充当着一种与可接受的社会秩序和价值求得一致的方案。

### 英国成长小说

在英国经典成长小说中，向社会上层流动是主人公成长的主要动因，也是成长的归

1 Al-Mousa, Nadal M. “The Arabic Bildungsroman: A Generic Apprai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5.2 (1993): 223.

2 Buckley, Jerome.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7–18.

宿，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英国经典成长小说大多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观念，在新兴中产阶级中寻找到最为适合的生长土壤。帕特丽夏·奥尔登（Patricia Alden）在对英国成长小说中的社会流动性的专门研究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从一开始，英国小说就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宠儿，他们回到如何使用这种形式更好地表达个体经验，并因此赋予其价值。日常事务，以及结婚、生子、死亡、遗产继承等人生大事，尤其是普通人得以规划自己人生轨迹的社会流动这种新体验，都成了小说的素材。关于普通男女价值的新思想以及社会流动的合法性于是就找到了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比成长小说更合适的了。<sup>1</sup>

这种对社会阶级跃层和对以财富积累为目的的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贯穿于整个英国经典成长小说发展历程之中。可以说，英国文学从 18 世纪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开始，就策动了一场男性漫长的自我成长的探求行动。《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曾明确提出把小说的创作对象确定为个体的人所经历的具体事件上，从而“让个体经验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sup>2</sup>。《鲁滨孙漂流记》正是这样一场个体经验的体验和个人历练的成长之旅。继笛福之后，另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也厚描了一个“个体经验”的体验和成长过程。他的鸿篇巨制《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在主人公汤姆·琼斯的经历和人生体验中，为“读者上了一堂人生教育课”<sup>3</sup>。弃儿琼斯不受欢迎的出生，到被逐出养父沃尔华绥（Allworthy）的天堂府，他精神迷茫，道德沉降，到最后获得身份，悔过自新，重返家园，这一历程构建起了经典的男性成长的模式雏形。

英国 19 世纪探索男性成长问题的最重要的作家当数狄更斯。他的三部代表作——《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同时也是成长小说研究中公认的经典作品。这三部小说体现了传统成长小说的几乎全部内涵和模式。主人公均为出身卑贱的下层社会的孤儿或是苦儿，他们的成长充满了艰辛和磨难，在一次次偶然和必然的机缘下，他们经历了身心的震撼和顿悟，终究寻求到自我价值和社会位置。贯穿于

1 Alden, Patricia. *Social Mobility in the English Bildungsroman: Gissing, Hardy, Bennett, and Lawrence*.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6.

2 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8 页。

3 李赋宁，《菲尔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年，第 303 页。

男性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往往还有对于自身身世之谜的寻求和破解，这更使得他们的成长充满了家族传承的使命感。

20 世纪上半期，英国文学中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的写作历时十年之久，可以说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有评论家认为“在本世纪追溯年轻人内心历程的‘成长小说’之中，《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可以说是最有深度的一部”<sup>1</sup>。这部小说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an Dedalus）在性格形成和心智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展现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时代初期的时代背景下，斯蒂芬如何克服了来自家庭、社会和教会的压力，最终在艺术的天地中找到了心灵的安居地。乔伊斯对成长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引入了成长中的“顿悟”观念。乔伊斯对“顿悟”曾经有过明确的论述：

首先我们认识到有关物体是一个整体，然后我们认识到它是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复合体……最后，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达到微妙的程度——各个部分都和某个特殊的点发生了联系时，我们认识到了它的实质。它的灵魂、它的本性冲破了它的外衣，跳入了我们的眼帘。当其结构如此调整之后，最普遍的物体的灵魂似乎在向我们灵光四射。此时的物体给我们带来了顿悟。<sup>2</sup>

经过乔伊斯的概括和文学实践，“顿悟说”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创作理论，其核心就是主张“通过艺术对生活的细节进行加工，从而把读者引入精神感悟的境界，产生豁然开朗的效果”<sup>3</sup>。这一观念在其后的英美成长小说，如《小镇畸人》（*Winesburg, Ohio*）、《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成为成长小说的特色和模式之一。乔伊斯对成长小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确立了一种成长小说的语言模式。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在人物成长的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从而实现了人物成长与小说叙事风格的完美结合。小说的开端描写斯蒂芬幼年的经历，小说的语言显得天真而稚嫩，句式也以简单句为主；而随着主人公年龄的增长，小说的语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斯蒂芬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他的语言呈现出文雅、学究气等特点，句式变得复杂，用词开始咬文嚼字，叙事的风格也变得严肃，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沉静深邃，

1 袁德成，《詹姆斯·乔伊斯——现代尤利西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88 页。

2 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8 页。

3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6 页。

总之，语言风格与人物的心智的成熟和成长结合得天衣无缝。乔伊斯所确立的成长小说对语言变化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其他英美作家。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经典成长小说中，作家无一例外地关注了语言的运用问题。乔伊斯对成长问题也从来未曾放弃过尝试和书写，他的“天才之书”《尤利西斯》（*Ulysses*）事实上也是一部充满了成长的诱惑的作品。这部著作与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之间结构框架和叙事模式的平行性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部作品中蕴藏着的漂泊和求索的主题。《尤利西斯》在意识流叙事中构建的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的成长，更是现代社会的嬗变，是关于整个西方文明发展变化的一部成长小说。

1983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姆·戈尔丁的《蝇王》是 20 世纪中期一部重要的成长小说。从小说的表层结构和含义来看，这是一部流行的“荒岛生存”小说。然而从深层结构和深层含义来看，《蝇王》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层解读和探索。在摆脱了社会规范限制的生存环境中，人性中邪恶的本原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从某种角度来看，作为成长小说，《蝇王》在对人物的成长模式的描述上，已经与经典的成长小说发生了背离，甚至是背叛。流落到荒岛上的孩子们，逐渐分化成两派：以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拉尔夫（Ralph）为首的有教养的一派和以出身低贱的杰克（Jack Merridew）为首的暴力派。两个孩子各自为政，不断发生冲突。拉尔夫希望孩子们能够文明地生活，互相团结；而杰克觉得过野人的生活充满刺激，不断鼓动其他孩子玩暴力游戏。结果以杰克为代表的“向恶派”逐渐成为主流，拉尔夫败下阵来。戈尔丁所勾画的人的成长轨迹迎合的是 20 世纪之初现代派的悲观和失望的情绪，以及现代派对人性和荒诞的现代社会的恐惧心理。同时，戈尔丁也告诉人们，成长的轨迹既可以是上升的，也可以是下降的，甚至可以是毁灭收场的。

## 美国成长小说

作为新兴的民族，美国作家对青少年的成长问题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这种热情的感召下，美国的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中所占的比例和取得的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以至于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尔（Leslie Fiedler）由衷地说：“美国历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中，只有亨利·詹姆斯一个人可以不算在儿童作家之列，即使是霍桑，虽然不同于马

克·吐温和麦尔维尔，其声誉也建立在他那些以青年人为题材的儿童所喜爱的小说上。”<sup>1</sup> 费德莱尔尤其偏爱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的《莫比·迪克》（*Moby Dick*）。当谈到这两本书时，他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美国人总是憧憬着童年。在我国文化遗产里为数不多的伟大著作中，有两本最令人神往的书，看见它们摆在儿童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谁会感到吃惊。这里指的当然是《白鲸》（《莫比·迪克》）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虽然在表现手法和使用的语言方面，两者迥然不同，但同样是儿童喜爱的书，说得确切一点，是男孩子喜爱的书。”<sup>2</sup>

费德莱尔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莫比·迪克》的高度评价折射出美国评论家偏爱的成长小说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在美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似乎更加年轻，通常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费德莱尔对此的解释也颇有代表性，他认为：“仅仅是找到一种语言，学习在一个没有社交常规的地方说话，没有特殊的等级习语和不同等级的对话，没有一种连续的文学语言，这些就已经让美国作家精疲力竭了。他永远都在开始，第一次讲述（没有一个真正的传统就不会有第二次）独自一人面对自然的感受，或者在城市里感受到的可怕的孤独，就像独自在原始森林一样可怕。”<sup>3</sup> 费德莱尔所强调的是，作为新兴的民族，美国缺乏悠久的文学传统，美国作家的创作就像懵懂的少年艰难求索，因此，美国作家也最能够体验成长的酸甜苦辣。美国作家的这种独特的体验与美国民族成长的体验也不谋而合。因此，美国的成长小说往往带有个人和民族的双重成长，并在个人与民族成长的既相互支撑又互相冲突的互动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对于个人成长与美国的民族成长之间的关系，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美国评论家都曾经十分关注。菲利普·扬（Philip Young）在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的“尼克系列小说”的研究中，就指出：“它〔尼克系列小说〕不只是建立在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之上，而且是建立在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之上。”<sup>4</sup> 对于菲利普·扬来说，年轻人成长的历程就是美国成长的历程，而年轻人成长的神话就是美国成长的神话：“这个出自美国人民经历的神话告诉我们的人民说，我们启程时，满面春风，对世界和所有伙伴抱着与

1 莱斯利·费德莱尔，《好哈克，再回到木筏上来吧！》，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0—341页。

2 莱斯利·费德莱尔，《好哈克，再回到木筏上来吧！》，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3 转引自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4 菲利普·扬，《世界和一个美国神话》，见董衡巽选编《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7页。

人为善的态度。我们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位天性善良、单纯、天真、满怀希望的少年。但是，我们步入人生的历程，便被打翻在地，从此一蹶不振，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sup>1</sup>事实上，美国作家意识的深处对成长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结：一方面是拒绝成长的情结，他们清楚地知道，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他们本能地拒绝成长；另一方面，成长过程的新鲜感又充满着诱惑，因此他们又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望成长的情结。这种矛盾心理构成了美国成长小说中的成长的焦虑，也形成了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情节推进方式和叙事模式。第二个特点就是美国作家和评论家界定的成长小说依旧是“阳性中心”的思考模式。费德莱尔特别强调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是“男孩子喜爱的书”，而他对美国成长小说的研究与巴克利在《青春季节》一书中对成长小说的研究遵循了一个共同的模式，那就是，所有被他引为范例加以研究和讨论的，几乎都是男性作家书写男性成长经历的小说。费德莱尔在其成长小说研究的力作《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一书中，追溯了从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在路上》(*On the Road*)的美国成长小说的发展，并确立了美国成长小说的人物、叙事等模式。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均建立在对男性成长小说的研究基础之上。

无论是德国的教育小说，还是英美的成长小说，其主体和模式主要是着眼于男性的成长，呈现出一种“阳性中心”的思考模式。无论是在追寻美国梦中的成长、历险中的成长、战争中的成长还是顿悟中的成长，其成长环境均是传统的男性的成长空间，其中，历险游历和战争战场更是“让女人走开”的男人的空间。在传统成长小说建构模式中，除了作为成长主体的主人公，成长的引路人也是美国成长小说中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个引路人也往往是由男性角色扮演的。芮渝萍在《美国成长小说》中对引路人的原型进行了论证：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来看，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原型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神和童话中的国王或白马王子。在宗教统治时期，神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统领着世间万物。他或指引迷途的“羔羊”，或拯救受难的子民。希腊神话中的人的命运都操纵在诸神手里，个人的意志和选择是有限的。在格林童话《马利亚代养的孩子》中，拯

1 菲利普·扬，《世界和一个美国神话》，见董衡巽选编《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救金发女孩走出荒野的是国王，但最后的拯救者是圣母玛利亚。随着人类社会从宗教统治走向世俗王权统治时代，国王或王子代替了上帝，成为“拯救者”。例如，唤醒白雪公主的是白马王子，拯救灰姑娘的也是王子。到了现代民主社会，普通人取代了皇家权威，但他的功能和作用不再是“拯救者”，而变成了“引路人”，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理念是，个人的权威应该是有限的，人们的目光也从高向低投向普通人身上。<sup>1</sup>

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成长小说引路人原型所呈现出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尽管圣母玛利亚曾经充当过拯救者的角色，但其意义与其说反映了女性拯救的力量，不如说更体现了神性的伟大。另外，圣母玛利亚的原型体现的更多的是母系社会和文化中对“母权”的崇拜。成长小说引路人的原型衍变曲折，折射的恰恰是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男性充当着女性的拯救者，充当着女性的引路人。因此，在传统成长小说中，这个关系不是互动的、双向的，而是单维的。对于以男性成长为主体的成长小说，其传统的模式也是男性充当领路人的角色。《莫比·迪克》中的正面引路人——“高尚的野蛮人”魁奎格（Queequeg）不但让伊什梅尔（Ishmael）认识到友谊和兄弟情谊的重要性，而且用自己的棺材为伊什梅尔充当了生命之舟；而艾哈伯（Ahab）船长则充当了反面引路人的角色，他的偏执和狭隘把全船人送上了不归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吉姆（Jim）则是哈克的伙伴和引路人，他不但让哈克学会了在自然中求生的本领，而且彻底改变了哈克对黑人的错误认识，使哈克从一个调皮的孩童走上了解救朋友的成熟之路。

女性生活在“文化的边陲”，“被动依赖而且不成熟”的地位在传统男性成长小说中得到了文学实践的生动体现。在《莫比·迪克》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女性是缺失的，看来麦尔维尔和马克·吐温似乎真的认为成长与女性无关。男性成长过程中女性的缺席在传统成长小说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中，女性也只是成了那片作为隐喻的大海而时隐时现。在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中，母亲反对弗莱明（Henry Fleming）上战场，因此弗莱明成长的起点是他试图挣脱母亲的束缚。在这里，母亲成了妨碍弗莱明走向成熟、走向被社会认同的男性价值的障碍。因此，弗莱明走向成熟的第一步是与母亲的较量，这与弗洛伊德（Sigmund

---

1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Freud, 1856—1939) 和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的精神分析以及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的规范婚姻纽带和亲属关系的社会法则的语言结构是不谋而合的。在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 的《小镇畸人》中, 母亲是一个让儿子乔治·威拉德 (George Willard) 感到尴尬的梦魇。母子之间彼此为对方的出现感到不安、尴尬和莫名的紧张。乔治热爱母亲, 却无从表达, 而母亲对他也暗暗关心, 却对表达关爱羞于出口。母亲是社会和家庭的牺牲品, 她在这个父辈留下来的小旅馆中耗尽了自己的青春、憧憬和生命; 从一个年轻的美少女变成枯槁的怨妇的过程浓缩了女性在封闭的小镇中生命的无奈。在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中, 女性成为男性梦魇的开始。盖茨比 (Gatsby) 的疯狂晚会是为了呼唤昔日的恋人黛西 (Daisy), 然而黛西的到来却带来了死神和幻灭。黛西天性贪图享受, 浮华浪荡, 她对任何男人都没有真正的感情, 她爱的只有金钱和地位。小说中对黛西的几次描写很能说明问题。在第八章, 尼克 (Nick) 转述了盖茨比对黛西的叙述:

黛西当年还很年轻, 而且又生活在一种浮华的社会环境中, 她的周围弥漫着兰花馥郁的香气, 洋溢着显贵傲慢的欢乐气氛。管弦乐队演奏着当年流行的旋律, 新的曲调反映出人生中的哀怨和彷徨。……

在这个繁星闪烁的宇宙中, 黛西又开始追逐新的欢乐; 她一反常态, 每天都要与五六个男人约会, 直到黎明的时候才昏昏沉沉地入睡, 夜礼服的珠子和纱巾同凋谢的兰花乱七八糟地丢在窗边的地板上。她的内心一直渴望着做出一个抉择, 她要立即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这一抉择必须有某种力量才能促成——爱情、金钱和真正实用的东西——而这一切又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sup>1</sup>

同样, 在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乔丹·贝克 (Jordan Baker) 不但无情无义, 而且满嘴谎言。这些女性的负面形象使尼克对爱情和婚姻不由得退避三舍, 他最终疏远了黛西, 也斩钉截铁地掐断了与乔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 远离了这些“美丽的小傻瓜”。在菲茨杰拉德的世界中, 女性是男性成长中的毁灭性的因素。

在男性成长小说中, 几乎没有一个女性人物真正经历了与男性共同的身体和心智的

---

1 F. S. 菲茨杰拉德, 《大人物盖茨比》, 范乐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203-204页。

成长，因为在男性的书写中，“女性成长的可能性被一一围堵”。可以说，传统的男性成长小说是一个“让女人走开”的文本空间。

### 拓展阅读文献

Alden, Patricia. *Social Mobility in the English Bildungsroman: Gissing, Hardy, Bennett and Lawrence*.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6.

Buckley, Jerome.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mra, Bruce. *Coming of Age: Literature About Youth and Adolescence*. Lincolnwood: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1999.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